

馬禮遜在澳門的文化活動初探

侯 傑* 黃景輝**

二百年前，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成為第一位來華從事傳教活動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他開創了包括翻譯聖經、纂修《華英字典》、創辦報刊、開設醫館和書院等在內的多項事業，對於基督新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對於他個人而言，自1807年9月4日搭乘美國商船在澳門登岸，至1834年8月1日於廣州病逝，後安葬於澳門，他將自己五十二歲的短暫一生完全交給了傳播上帝之愛的事業。在華二十多年中，馬禮遜的傳教活動一度受到清政府、天主教會、東印度公司的各種阻撓。可貴的是，他不怕困難，冒着危險，以靈活多樣的方式，追求着自己的夢想。由於清政府對於外來宗教採取了十分嚴厲的禁教政策，馬禮遜的傳教活動多是在澳門進行的。雖然國內外學術界對於馬禮遜的傳教活動關注很多，但是專以澳門為中心的研究尚不多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為彌補這一缺失，本文擬集中對馬禮遜在澳門的文化活動進行初步探討。

初到澳門

1782年，馬禮遜出生於英國北部小鎮莫佩思（Morpeeth）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宗教環境的薰染。1798年，十六歲的馬禮遜受洗，加入英國長老會，成為教徒；不僅如此，他還立志成為一名赴海外傳佈基督福音的傳教士。1807年1月8日，馬禮遜在倫敦被按立為牧師，受倫敦傳教會派遣來到中國，成為第一位來華從事傳教活動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

當時在英國國內以及在印度等地的基督徒，似乎並不支持甚至反對傳教士到海外傳教。“英國和英國影響所及的印度，對傳教士所作的努力持有強烈的偏見，反對傳教士到海外傳教的聲浪很高。”⁽¹⁾就在這樣的歷史境況中，馬禮遜開始了自己的東方之行。1807年1月31日，他從格雷夫桑(Gravesend)啟航，借道美國，從紐約直航中國。1807年9月4

日，經過數月漂泊的馬禮遜搭乘美國貨船“三叉戟號”(Trident)抵達澳門。在澳門，他幸運地見到了東印度公司職員斯當東爵士(George Thomas Staunton)和查墨斯(Chalmers)。然而，他所聽到的各種消息無論如何也讓人高興不起來。查墨斯直言不諱地告訴馬禮遜：中國人是被禁止對從歐洲來到澳門的西洋人教授中文的，如果被發現，就要被判處死刑。而斯當東也提醒馬禮遜：駐紮澳門的東印度公司是禁止除了經商者之外的任何英國人在澳門居住。對此，馬禮遜感慨良多。1807年11月4日，馬禮遜在寫給倫敦傳教會司庫哈德凱斯爾(Joseph Hardcastle)牧師的一封長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心聲：

船到澳門之後，我在那裡停留了大約二十四小時，會見了東印度公司的職員斯當東爵士和查墨斯先生。他們對我說要住在澳門困難是很大

* 侯傑，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基督教史、社會性別史等領域的教學和研究。

** 黃景輝，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研究助理，主要從事宗教史、社會性別史等領域的研習。

的，一是有中國人，二是有葡萄牙天主教傳教士，三是東印度公司嚴格禁止非貿易英國人居留在澳門。因我既不是東印度公司的人，又是天主教所仇視的新教傳教士，更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²⁾

儘管困難重重，馬禮遜還是堅持在1807年9月8日到達廣州，並在那裡開始了為傳教做準備的學習生活。由於學習十分用功，加上精神過於緊張，以及絕大多數時間祇能呆在房間裡，缺少室外活動，所以馬禮遜的身體很快就出現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建議他去澳門休養。在澳門的友人向馬禮遜伸出援助之手，願意為他居住在澳門提供各種幫助，這讓馬禮遜多多少少感到一些安慰。他在1808年5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

今收到皮爾遜醫生 (Dr. Pearson) 從澳門來信，告訴我羅伯茨大班 (Mr. Roberts) 表示願意資助我的計劃，編一本《華英字典》，他認為東印度公司不會反對此事。皮爾遜醫生還催促我搬到澳門去居住，他認為當地葡萄牙政府和羅馬天主教會不至於阻撓這事。⁽³⁾

由於得到了朋友的熱情許諾和友善的幫助，馬禮遜於6月1日乘船離開廣州前往澳門。在澳門，馬禮遜和他的中國助手住在一起，使他可以堅持每天學習中文。與此同時，由於得到皮爾遜醫生的悉心照看，幾個月後，他的健康狀況逐漸得到改善，身體終於康復了。1808年8月31日，馬禮遜曾經試圖回到廣州。可是到了10月，中國官府下令所有在廣州的英國人離境，他因此不得不於當月回到澳門。1808年底，馬禮遜在寫給倫敦傳教會的信中提到：

目前應說明的是，我還不能指望可以進入中華帝國工作，要等到中國真的能開放有了很大的自由，但現在是無法達到的心願。我所提出要做和已經在做的工作，現在祇能在澳門或到檳榔嶼才可以更好地完成。⁽⁴⁾

顯然，馬禮遜初到澳門，感覺並不十分順利。然而，他還是堅持下來了。

在澳門的愛人、同道與後繼者

馬禮遜到中國之後，從一開始便嘗試着用筷子吃飯、穿中國長衫、留長指甲，嘗試着盡快使自己中國化。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發現，和中國人一起用餐並沒有怎麼增進自己的語言知識，而中國式的穿着更容易招致當地官府的注意，於是他便努力使自己的穿戴符合一位牧師的樣子。⁽⁵⁾ 不可否認，對於孑然一身到中國傳教的馬禮遜來說，來到中國最初的那段日子是相當孤獨和寂寞的。他在1808年1月7日的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目前我感到情緒上有點抑鬱，因為我在此相當孤獨，沒有一個人可稱之為朋友。⁽⁶⁾

在馬禮遜搬到澳門之後寫給父親的信中還提到自己在澳門的生活並不安定：

澳門是羅馬天主教的地盤，不屬於英國的新教教徒，他們認為我不可以住在澳門。⁽⁷⁾

儘管如此，馬禮遜還是在澳門生活下來了。特別是在1808年11月結識了摩頓 (Morton) 一家人之後，馬禮遜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他們不僅常常在一起禮拜上帝，而且增進了彼此的瞭解，建立起友誼。特別是當馬禮遜認識了摩頓家的瑪麗小姐 (Mary Morton) 之後，兩人的交往增加，感情發展迅速，終於在1809年2月20日，馬禮遜與瑪麗小姐結婚了。這一方面消解了馬禮遜隻身異域的孤獨感，另一方面為他開展傳教活動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與此同時，澳門的東印度公司還聘請馬禮遜做英國商行的譯員。這一切都使得馬禮遜在澳門定居並適時開展傳教活動得到一些保障。在1809年2月23日給父親的信中，他寫道：

本月20日，我已和摩頓小姐結婚了。她是摩頓博士的女兒。摩頓是來自愛爾蘭的一位紳士。由於我已和一位我所愛的女子結婚，她又是那麼真誠地依戀於我，你過去對我獨自一人份外的孤獨的擔憂，將會有所減輕了。……在澳門的東印度公司已聘請我擔任英國商行的譯員，年薪有500英鎊。(8)

在澳門，馬禮遜不僅收穫了愛情，還贏得了友情。1813年7月4日，倫敦會派遣作為馬禮遜助手的米憐(William Milne)夫婦到達澳門。馬禮遜在日記中記道：

今天是禮拜天，大約在下午3點鐘，我和愛妻瑪麗坐下正準備舉行聖餐禮時，忽然有人通知我，米憐先生和夫人已在澳門登岸了。我們當然都非常興奮，這種既有喜也有憂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這位我期待近七年之久的同工，現在終於從我們的遙遠的祖國真正踏上了中國的土地。(9)

米憐一到澳門，馬禮遜就向澳門葡萄牙當局提出請求，希望米憐能獲准住在澳門。可是，“在澳門，不論是英國人還是葡萄牙人，都對他倆抱敵視態度。我相信有人已經向總督告狀，最後，立法會議開會討論後全體表決：‘米憐先生不得居留澳門。’”(10)7月9日，馬禮遜被總督召見。馬禮遜單膝向總督下跪，懇求他不要下達命令，延長米憐在澳門的居留時間。到最後，總督看在與馬禮遜的友情上，把米憐在澳門停留的時間從八天寬限到十八天。(11)

1813年7月20日，米憐還是離開澳門去到廣州。可是，廣州也嚴禁外夷居住。(12)所以在這一時期，馬禮遜和米憐為居住的問題而苦惱，即便是在商討如何實現傳教目標等問題時，也不禁為此發愁，生出許多感慨。馬禮遜認為，要使中國人皈依基督，自由地住在中國的中心地區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可惜目前還無法辦到。在澳門、廣州不

能開展自由傳教的情況下，馬禮遜就把南洋及馬來半島作為設立傳教總部的合適地點，最後決定讓米憐離開中國，前往麻六甲建立一個傳教差會。1815年4月17日，米憐偕夫人離開中國，6月初平安到達麻六甲。儘管米憐沒有能夠得到與馬禮遜經常相處的機會，但是米憐的到來，還是使馬禮遜孤單沮喪的心情有所好轉，獲得了不少安慰，實際上，這對馬禮遜的傳教活動也產生極大的幫助。

馬禮遜的愛妻瑪麗於1821年6月10日在澳門病逝，而他的同道米憐也於1822年6月2日病逝。愛人和同道的相繼去世給馬禮遜以沉重打擊，但是他的傳教信念並沒有消泯。1824年至1825年，馬禮遜在短暫的回國述職之後，於1826年重返澳門。在澳門，他仍舊盡心盡力做着聖經的註釋和辭典、報刊的編訂工作。1830年，首批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牧師和雅裨理(David Abeel)牧師抵達中國。對於他們的傳教活動，馬禮遜給予大力幫助。這從美國公理會給馬禮遜的信中可以得知：

請容許我代表美部會委員會對你熱情接待裨治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你為他聘請了一位中文老師，特別是要感謝你慷慨地給他參考書籍幫助他學習中文，也要感謝上帝。(13)

在1832年，又一位美國傳教士司梯文斯(Edwin Stephens)到達中國，他與馬禮遜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在澳門開創的事業

《聖經》的翻譯與《華英字典》的編纂是馬禮遜作為基督教新教在中國開山鼻祖的最大功績，而這兩大功業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澳門完成的。

馬禮遜到達中國後便着手翻譯聖經。在教友米憐的幫助下，並參考原來從大英博物院抄來的一冊稿本，1810年翻譯完成《新約》中的《使徒行傳》並付梓；1813年翻譯完成《新約》，到1819年11月完

成全部《聖經》中譯本，取名“神天聖書”。對於聖經翻譯過程中的語言選擇，馬禮遜在1819年寫給倫敦傳教會的詳細報告中說：

在我進行翻譯時，我曾苦心研究如何才可達到忠誠、明白和簡潔的境界。我寧願採用通俗的文字，避免使用深奧罕見的典故，力求不用異教哲理和宗教的專門名詞。我傾向於採用中國人看作為俚俗的文字，不願使用令讀者無法看懂的文體。遇到難譯的句子，我竭盡所能旁徵博引，務求達到不脫離原著的意義。⁽¹⁴⁾

馬禮遜結合自己學習中文的體會，同時利用在東印度公司做翻譯的便利，不斷積累，最終完成了其得志之作——《華英字典》的編纂工作。從1815年到1823年，《華英字典》陸續出版。作為中國第一部漢英字典，《華英字典》的影響尤為深遠。《華英字典》裡面的英漢解釋融合了中西文化，為後來傳教士在學習中文傳播教義方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同時，也為後來中國乃至日本的英漢辭典的編纂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在1919年，倫敦傳教會的報告曾提到《華英字典》的編印情況：

馬禮遜博士在去年11月初編完《華英字典》的字母部分後，已經寫了一篇題為“從語言學看中國”的論文，連同他在1817年在澳門編成的《演講集》，已一起在澳門印刷了。這些英文集子將向私人散發。⁽¹⁵⁾

除了上述兩者外，馬禮遜的重要的漢學研究著作還包括1811年出版的《通用漢言之法》，1817年出版的《中國大觀》，1828年出版的《廣東省土話字彙》等。《雜聞篇》是馬禮遜1833年在澳門創辦的中文週刊，它可說是《福音傳道者與中國雜錄》(Evangelist & Miscellanea Sinica)的中文版，每期雖然僅有四頁，印數卻多達兩萬份。但是，由於清廷採取了禁止的措施，所以祇出版了三期就被迫停刊了。⁽¹⁶⁾

1820年，馬禮遜在澳門開設一家專為貧苦病人服務的診所，聘請有名的中國醫生和藥劑師相助，開辦不到數月，就有三百人就診治癒。後來，由於東印度公司職員郭雷樞(Thomas Richard Colledge)在眼科上頗有專長，在他的幫助下，馬禮遜和李文斯頓將診所擴大，於1827年在澳門又租賃兩間平房開設眼科醫館。這是一個專為缺錢看病的窮人提供服務的慈善醫館，前去就診的人由東印度公司發給免費憑證。“據說，每天就診人數有時多達四十人。除澳門外，也有一些鄉村農人前來診治。到1832年10月，治療的人數即達四千人之多。”⁽¹⁷⁾馬禮遜醫藥傳教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國人對外國傳教士的敵視和偏見。對於馬禮遜的醫藥傳教善舉，李文斯頓醫生專門寫了一份報告，刊載在麻六甲出版的英文《資訊》(The Indo-Chinese Gleaner)裡，其中提到：

我很高興的報告，馬禮遜博士開設的診所已經做了許多好事，不少中國病人已得到醫治，已經有三百個治癒的病人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謝，其中一些病人是用西醫治好的。沒有一個病人死亡。⁽¹⁸⁾

澳門東印度公司對馬禮遜《華英字典》的印刷出版不僅給予了一定的資金支持，同時還專門派了技師湯姆士(P. P. Thoms)幫助印刷。由於《華英字典》中英文互排的版式特點，採用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難度較大，而浩大的工程也容易引起中國政府的警覺。於是，1814年4月，受東印度公司的委派，湯姆士帶着一台印刷機和一副活字搭船前來。1814年9月，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建立印刷所。在1815年1月馬禮遜寫給倫敦傳教會的報告中提到：

我譯的《創世紀》已在印刷中，希望最近幾天能完成。完成之後，我將寄幾份清樣給你們。我以上提到的我正在編纂字典的工作，在作出上述安排後，將全力投入此工作。東印度公司董事

會已決定支付這部大字典的印刷費用，且已從英國運來了一部印刷機。(19)

1815年2月，《華英字典》開始印刷，在1816年印好第一批。(20)由於字典印刷的過程中僱用人手較多，加之幾個中國工人因事發生口角，其中一人向當地縣署報告，導致《華英字典》的部分刻版被澳門中國官府抄走。(21)為了避免官府發現，聖經的刻版也不得不自動毀掉，以後祇能再請工人重新製作刻版。馬禮遜的漢譯《聖經》、《華英字典》等出版物在澳門的刻版印刷，推動了西方近代印刷術向中國的傳入，加速了文化交流的進程。

在澳門傳教及新教受洗者

雖然馬禮遜在聖經翻譯和辭典編纂上付出了很多的精力，但是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作為一位來華傳教士的傳教責任。從在澳門居住開始，他便努力地勸說自己的中文教師和僕人一起參與安息日，一起禱告。由於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傳教的成效在短期內並不十分顯著。但是，成果還是有的：常常有十來個人聚集在緊閉的房間內室，馬禮遜在那裡宣講上帝的福音。在1813年12月12日禮拜天的日記中，馬禮遜提道：

今天有十二個人參加崇拜。米憐先生送來兩個人。高先生讀經。我這裡有三個年輕人每天跟我學習《教義問答》。我今天講解了基督徒與世界、撒旦和肉體的戰爭。呵，求上帝賜福給我這微弱的努力。(22)

在當時的澳門外僑中，流行着以消遣娛樂的方式度過安息日之夜的習俗。馬禮遜開辦了晚間講座，帶領當地的僑民進入一種更高的娛樂境界。在為僑民的晨禱結束後，他接着提出為中國人舉行一次晨禱，他的最大快樂在於為中國人所做的晨禱之中。他從來沒忘掉飽含深情地高唱讚美詩這一個環節，常常是從頭至尾參加整個唱詩過程。安息日的

禱告要使馬禮遜連續站立五六個小時，但他仍然覺得很高興。如果有人問他累不累，他會回答說：“累。工作是累，但工作本身並不讓人累。我樂在其中。”(23)

馬禮遜雖然是基督教新教的傳教士，但是他也不因為信仰的差異，拒絕與天主教、道教等異教人士進行交流。在1812年10月16日的日記中，馬禮遜記述道：

今天，我到廟裡送給一位道士我譯的《四福音書》、《使徒行傳》和勸世文，以及《教義問答》。他接受了這些書後向我道謝。(24)

過了一段時間，馬禮遜再次回訪了這位道士。

他說他已讀了我的贈書，他認為都是好書，已轉送給其他的老道士閱讀。(25)

對於天主教徒，馬禮遜也一樣贈送自己的譯作和印刷品，儘管澳門天主教的主教後來嚴厲責備了與馬禮遜談話並接受贈書的中國天主教徒。(26)

蔡高到馬禮遜家的時候是二十一歲，經過了三年多的薰染，他漸漸懂得了馬禮遜宣講耶穌的意旨。當他住在馬禮遜家附近的時分，總是在禮拜天來到馬禮遜家和大家一起崇拜上帝。雖然蔡高的脾氣有點不好，但是具有一種宗教的虔誠，馬禮遜最後決定為他施洗。1814年7月16日，馬禮遜在澳門“東望洋”海濱一個幽靜小山邊的泉水間為蔡高施行了洗禮。(27)蔡高成為第一位中國基督徒，同時也是馬禮遜在華傳教七年以來的第一位受洗者。對於洗禮當天的情景，馬禮遜在7月16日的日記裡有所記述：

在遠離人們所能看到的海邊，從高山上流下的潺潺溪水中，我奉聖父、聖子和聖靈的名，為蔡高施行了洗禮。懇求上帝用耶穌的寶血洗淨蔡高一切罪孽，用聖靈的影響，潔淨他的心田。願他是大豐收時初熟的菓子，成為將來千千萬萬中

國人皈依基督後，從天怒中被拯救出來的第一個基督教新教的信徒。(28)

1823年12月，馬禮遜按立梁發為牧師。當時，梁發已經與馬禮遜同事八年之久。馬禮遜翻譯聖經的刻版印刷工作大多出自梁發之手。早在1815年4月，梁發就被馬禮遜派往麻六甲協助米憐開創傳教的新基地。1816年11月3日，梁發受洗於米憐。(29) 馬禮遜在1826年10月初寫給倫敦傳教會的報告中，詳細介紹了梁發的傳教情況。在馬禮遜回國述職期間，梁發寫了一本中文小冊子《希伯來書註釋》和另一本小冊子《救世真詮》。對於《希伯來書註釋》，馬禮遜評論道：

我讀了該書的一部分，發現梁發確有其長處。他已把聖經作為研究的對象，雖然某些地方的語氣帶有一些異教色彩。(30)

1829年夏天，梁發因為在家鄉創辦學校，宣傳基督宗教思想，遭到官府追捕。為此，他逃到了澳門，找到馬禮遜博士，繼續跟隨他深入學習基督教義。(31) 在1832年一年的時間裡，梁發編印了九種勸世文，由馬禮遜審定後印刷散發。1833年到1834年的兩年間，梁發及其門人在春秋考試期間將大量的小冊子帶到貢院前贈送給士子。洪秀全正是在1836年春季參加省會考試時，偶得了《勸世良言》小冊子，進而對他後來創立拜上帝會產生了很大影響。(32)

在澳門的葬禮

1833年，由於受到澳門天主教教徒的控告，馬禮遜在澳門從事印刷佈道的活動受到了制約。1833年6月22日，澳門東印度公司大班迫於澳門天主教的壓力，要求馬禮遜停止在澳門印刷出版物。信中提到：“因為在葡萄牙所屬的澳門境內是禁止私自設置印刷所的，除非事先經過審查批准。今特通知你，請停止在澳門使用你的印刷機繼續印刷出版

物。”(33) 儘管馬禮遜不能用自己喜歡的方法傳播真理，但是他在中國助手梁發等人的幫助下，仍然盡心盡力地做着傳播耶穌福音的工作。馬禮遜堅持編撰他的《聖經註釋》，還繼續在禮拜天主持英文教會的禮拜，隨即去中國人聚會處證道。馬禮遜的住宅前面是一塊空地，面對澳門海灣，空地上栽種着歐洲的植物和花卉。在工作之餘，馬禮遜的最大樂趣便是和家裡的孩子們一起欣賞自然之美。然而，此時馬禮遜的身體狀況已經明顯惡化，在夏天酷熱的時候，常常會四肢無力，右腹疼痛，胃口不佳。經過東印度公司醫生診斷，馬禮遜的肝病已經很嚴重了。(34)

1834年6月19日，即馬禮遜去世前一個月左右，他寫完了自己的最後一篇證道辭，所選用的經文是：“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準備地方去……”(35) 在1834年7月27日的禮拜天聚會中，馬禮遜召集了十二位華人來聽道。他竭盡全力地向他們證道，一起高唱讚美詩。在8月1日晚上，馬禮遜的呼吸曾經一度短促。醫生設法醫治他的胃病，但是效果並不明顯。醫生向上司報告了馬禮遜的嚴重病情，並決定送他到澳門去治療。船在當晚到達廣州，準備第二天送馬禮遜去澳門。然而，馬禮遜於8月1日晚病逝。

關於馬禮遜去世前那天下午的情形，美國傳教士司梯文斯回憶道——

我坐下來，他就坐在我身旁背誦了經文：“我決不離開你，也不捨棄你。”“我們有一所屋子不是用手建造的，而是在天上得永生。”他一遍又一遍地說給我聽。(36)

澳門的歐洲人聞知馬禮遜博士的遺體到達澳門，許多人懷着悲傷的心情來參加葬禮。馬禮遜的靈柩安葬於東印度公司的墓園，這是馬禮遜為了基督新教徒努力爭取到的一方土地。當時，牧師司梯文斯主持了友人的葬禮。馬禮遜博士的墓碑由英國畫家欽尼設計，碑文用英文撰寫，以簡短的篇幅概括了他在中國的偉大功業：

馬禮遜，神學博士，首位派往中國的新教傳教士。他在中國服務二十七年，編纂和出版了《華英字典》，創辦了在麻六甲的英華書院，完成了中文版聖經，並於生前親見其完成的譯稿出版並大量散發給中國人。如今他在耶穌懷裡安睡了，他是1782年1月5日在英國莫佩斯生，1807年由倫敦傳教會派駐中國傳教。在澳門東印度公司任中文議員長達二十五年，1834年8月1日在廣州逝世。從今以後，那在主裡面死去的人有福了。這是聖靈說的，他們將在工作之後得到安息，而他們所做的工作將由後人繼續做下去。(37)

結語

馬禮遜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雖然祇有短暫的二十幾年，但是他所開創的各項事業對於基督新教在中國的傳播、中西文化交流都產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響。因此，在二百年後的今天，他的功業仍然讓人感念不已。馬禮遜於19世紀初於中國的傳教活動雖然受到了各種阻礙，卻終於獲得了成功。他堅定傳播福音的理想與當時的時代環境相互激蕩，從而成就了這位基督新教傳教先行者。馬禮遜在澳門的文化活動，既說明澳門在19世紀初期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地位，同時也展現了懷有救世情懷的傳教先驅馬禮遜，如何將西方基督新教的宗教文化以澳門為起點向中華大地傳播開來。

【註】

- (1)(2)(3)(4) 《馬禮遜回憶錄》，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4；頁41-42；頁47；頁51。
- (5) [英] 湯森：《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王振華譯，頁58，大象出版社，2002年。
- (6)(7)(8)(9) 《馬禮遜回憶錄》，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45；頁50；頁550；頁88。
- (10) 《馬禮遜回憶錄》，[英]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頁89，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11) 同上，頁89；另見譚樹林：《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頁169，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
- (12) “1805年4月，嘉慶帝頒諭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同年11月，又嚴審廣東省禁止傳教。” [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頁149。轉自譚樹林：《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頁140，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
- (13)(14)(15) 《馬禮遜回憶錄》，[英]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69；頁154-155；頁145。
- (16)(17) 譚樹林：《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頁273；頁155-15。
- (18)(19) 《馬禮遜回憶錄》，[英]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159；頁113。
- (20) 譚樹林：〈馬禮遜與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刊於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9期，2003年冬季版。
- (21)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95-98，臺灣學生書局發行，2000年。
- (22) 《馬禮遜回憶錄》，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頁93，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3) [英] 湯森：《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王振華譯，頁154，大象出版社，2002年。
- (24)(25)(26) 《馬禮遜回憶錄》，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81；頁82。
- (27) 《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簡又文編撰，頁15，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6年。
- (28) 《馬禮遜回憶錄》，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頁111，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9) 《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簡又文編撰，基督教輔僑出版社，頁19，1956年。
- (30)(31) 《馬禮遜回憶錄》，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55；頁266。
- (32) 《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簡又文編撰，頁23，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6年。
- (33)(34)(35)(36)(37) 《馬禮遜回憶錄》，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84；頁286；頁298；頁306-307；頁305。

